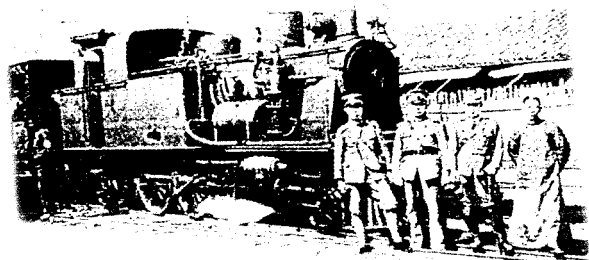




YI GE XI FANG JI ZHE YAN ZHONG DE
XI AN SHI BIAN



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 西安事变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英国作家贝特兰的一部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文学作品。系《走向中国丛书》之一种。

全书共分20章,作者以亲赴西安、探寻事变真相的见闻为线索,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精到的笔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客观地分析了事变的深刻原因和深远意义。外国作家和记者的特殊身分,使得贝氏能够接触一些熟知内情的重要人物,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揭示了各派政治力量冲突争斗最终走向团结御侮的复杂内幕,对于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张学良、蒋介石等人的形象性格亦刻画入微。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走向中国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国伟

孙继林

肖关鸿

谷 梁

张 晨

施伟达

编辑说明

编辑出版《走向中国丛书》，其想法源于多年前的一场文化讨论。在那场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中，诸多学界精英，他们就20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阐述着各自不同的见解。这场讨论接续了20世纪初，学界那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浩大争论。从世纪初到世纪末，跨越一个世纪的学术争论，恰好与中国门户开放的历史性曲折演变轨迹相呼应。于是，讨论不但具有历史意义，更有了现实意义。

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史，客观上证实了，社会的变迁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有其演进规律的，历史的发展也总是一步步逼近真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一位朦胧诗人的诗所云：当你站在窗口看外面的风景，你也就成为窗外人眼中的风景。这种互动和双向流动，客观上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就像科学和民主，是社会文明进程的两大助推器一样。

今天，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将完全融入国际经济结构中，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已经成为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随着“入世”的加快，中国正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而世界对中国关注的目光，也将跟随我们这套《走向中国丛书》，回溯到世纪之初。

《走向中国丛书》，辑入的是在20世纪初和上半叶，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新闻记者、探险家、作家等，用他们的笔记下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他们以纪实的文体，从一个特殊的

视角,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和民情。我们期望,这种特殊的历史记录,能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有参考价值的文本。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价值评判标准的区别,书中所述势必带有很多局限性,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无论是我们编辑《走向中国丛书》的初衷,还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都印证了钱钟书先生所言:当中国走向世界时,世界也在走向中国。

《走向中国丛书》编委会

2000 年 8 月

目 录

第一章	古都的旗子	1
第二章	蒋介石死了?	13
第三章	到西安去	20
第四章	东北的背景画	31
第五章	重赴西安	43
第六章	禹庙里的囚徒	56
第七章	武装的城市	69
第八章	“剿匪”时代的张学良	80
第九章	“事变”的爆发	90
第十章	有趣的重逢	100
第十一章	千钧一发	111
第十二章	西安琐记	120
第十三章	宣传	123
第十四章	快活的新年	133
第十五章	群众大会与传教士们	144
第十六章	保卫大西北	156
第十七章	民众的武力	167
第十八章	红军访问记	179
第十九章	“事变”中的事变	190
第二十章	中国统一战线万岁	200

后记一	210
后记二	212

第一章 古都的旗子

有些城市战胜了它们的命运：雅典仍在四郊的丑恶中继续活着；罗马始终是有7座小山的罗马；但北平不再是中国的了。

此次失陷，差不多是一个晚上的事，事前的围城是历史上时间最短的围城。1937年的仲夏，7月28日，宋哲元^①将军抱着空前的决心，表示抗战到底，外国人像兔子一样逃避到使馆区。穿着灰色军服的二十九军的兵士，在街上沙袋后边装出憎恶的脸相或沿着厚厚的城墙勇敢地踱着大步。7月的太阳从他们无鞘的大刀上擦出火来。

这一天从早到晚，日机不断地向城外毫无掩蔽的华军阵地丢着炸弹，未遭抵抗，得意扬扬。第二天早晨，北平出现了一种异样的、不认识的平静。穿着灰色军服的人们离开了。只留着沙袋，沙袋上飘着一面日本旗。

原来在半夜，宋将军含泪率部离平赴保定。在此后一星期中，城内中国警察自动解除了武装，以防意外。8月8日，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在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

^① 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1933年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军。

奇怪得很，大家对这件事并不怎样惊讶；他们早在期待着这一着，一旦成为事实，倒使他们放下了心。日军占领北平，或“北平的失陷”，不过是一个早已发作的疮毒的外表上的征号而已。

“北平死了。”一个美国诗人在一首挽诗里已作如是观，这首挽诗很可用以凭吊这最近的浩劫：

唔，当一个美丽的皇后般的城市丧失了她的名誉时，你该感到悲伤；

你说到她被强奸时，该感到痛苦，

正如诗人们说到一个活跃的城市失陷一样。

但北平并没有被强奸，

她被淫污，正如蠢笨的娼妓之被淫污一般，为了营业，为了金钱。

北平，古老的北平哟，她以前从未不战而降，

在她长长的失陷史上。

北平不再是帝都了，鬼影森森的宫殿用空虚的眼睛向你凝视，

还有紫禁城内琉璃瓦铺成的皇宫顶上的龙檐……

黄瓦的行列上的皇龙，看来是那么驯善而无恶意，

活像晒在秋天屋顶上的金色谷粒的行列中的毛虫。

这是两年前的事，而华北古都的挽歌已经写就了。

1936年我到北平，在一所中国的大学里工作时，我发现北平是一座盖着白雪的美丽的城市，而同时又比都柏林或但泽更富于政治的矛盾。名义上的当轴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日人于

1935年末竭力推进“华北自治运动”，^①而结果出现了这个机关。从泰山的娘胎里生下了一只小老鼠。但这依然是中国的小老鼠，它表面上（即使不是血统上）还是属于南京政府，虽然政委会的委员们常常设宴招待日本军官。

那时候，北平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中国学生们一向是全国最活跃的政治要素之一。对日人所策动的“自治”运动，只有平津学联发出真正的反抗，它组织了12月9日和16日的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这些示威运动很有力地证明华北民众并不喜欢在日军卵翼下的“自治”。但学校当局的态度——人在这里又感到那种流贯于一切政府机关的传统的逆潮——却不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他们向学生劝谕，威胁，或教训他们别管“政治”，教他们献身于新生活运动一类的可亲可爱的事物。

如后来的事实所昭示，学生们是北平唯一真正了解时局的集团。他们在北平市和四周的村庄组织示威运动，要求当局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如军事训练，组织群众，准备应付他们所看见的日益迫近的战争，他们是唯一主张抵抗日军侵略华北的一群。所有残留在垂死的古城的生命，就靠这几千青年的力量而得以保存，而学校当局原要他们专心读书，磨练德行，把他们祖国的生存问题放在第二位。

那时北平的空气是不利于政治的热情的。一般的观念——此种观念在外侨的圈子里特别普遍——都以为学生故意在学期的末尾“玩弄政治”，借以逃避他们的学校考试（他们显然宁愿去冒明知难免的枪弹的危险，而不愿去冒尚难预卜的考试场的危

^① 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夺取中国华北地区的统治权，于11月策动汉奸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校注）

险)。那庄严的、令人倾慕的英国大使馆，坚决相信有人——大概是莫斯科——以每人两角钱的代价收买这些孩子，叫他们去尝尝机关枪、逮捕和用以对付政治犯的中国传统的酷刑的味道。

但这外侨社会，这为女小说家们所爱好的，被人所称誉的北平“交际社会”，它本身就是一个稀有的美妙的世界，它的不能避免的死亡，无疑的将为所有把北平作为自己避难所的外籍审美家们所哀悼。如果北平能继续活下去，它将成为独一无二的胜地。

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的错误，一所残存的胜地，像世界大战前佛罗伦萨的外侨社会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现代的中国有时向它冲击，但次数很少。它的各种娱乐很优雅，稍稍有点颓废，构成了古都的生活。在北平这个世界里，没有谁在发育，而设宴请客，或月夜访天坛，算是这世界里的正经事。（北平的魔力正如牛津的魔力一样，足以制人死命。生活在这两个地方的人是难得觉醒的。）

由于这一切的缘故，北平所有的聪明精巧的外侨比任何别的中国城市为多。他们大都对于中国有一种真正的感情，不过我觉得这往往是对过去的中国的感情。他们探寻古雅的或美丽的东西：一架放在庙堂里的无线电机，或企图代替绝妙的汉字的拉丁化文字，都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他们会到前门外不舒适的戏院里去听名角梅兰芳或者程砚秋的京剧。然而对于不很有礼貌的写实的中国戏则加以攻击。他们从唐诗优雅的诗页上领略到过去的风味，但不能从报纸上领受目前苦痛的琐事。清朝以后，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清王朝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历史的错误。

他们所感到兴趣的，是定型化了的的中国，不是变动中的中国。

北平——这过去了的帝都，它的一切都适宜于他们的生活。北平比现代中国任何其他动乱的大城市都给他们更少的感触。它有坚厚的城墙护卫他们，有一年一度的博览会迷醉他们，有高出洋杉丛荫的金色屋顶的行列和西山美丽的山脉供他们欣赏。北平是中国的灵魂的最后安息地——直到日本兵来揭破那些空虚的秘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另一个北平许会出现，会使日人的旅行业更加繁荣；在相当的时候，清朝的天子许会重登龙位。但大概不会有许多外国人在那里欣赏这种景象了，北平的生活永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的生活了，这对于女小说家们该是一种绝大的悲哀！

到末尾，甚至北平“交际社会”也被关于日益迫近的浩劫的流言所震撼了。当日军在城下进行小规模战争的时候，当天皇的神圣的坦克车在大街上不顾一切地往前直冲的时候，要保持部队正常的纪律，是很困难的事。中国的商人们站在各自的店门口，在不可思议的静默中瞩望“皇军”的行进。没有一点反抗的声音。

在整个的北平，只有学生们发出呼声。在1935年12月以后笼罩着“华北”的武装和平的氛围中，只有他们敢于组织自己的队伍，敢在日军的坦克车任意横冲直撞的街道上喊出民族抗战的呼声。当大旗在牌楼下面被举起来的时候，当成千的学生在堽壕和紫禁城上的大城楼旁边行进的时候，冲散他们的行列，迫使他们回头的，是中国警察的毛瑟枪和大刀。

这故事始于1936年12月12日北平的学生示威运动。这是这一类运动的最后一次。

当黎明在陕西出现的时候，当蒋介石正在临潼后边的积雪的小山上被困的时候，一种类似的秘密活动在北平各中学和大

学里进行着。一群一群的学生穿过后门,或爬过宿舍的墙壁,来到阴暗的胡同里。他们穿着棉袍,围着羊毛围巾;许多女学生穿着蓝色绒线衫和法兰绒衬衣。这前卫的队伍带着卷起的旗子和一捆一捆铅印的传单。他们准备来一次爱国游行,而警宪们也许得到了风声。

这一天的清早,匆匆吃了早餐,我和一群新闻记者一同出发,探寻游行示威的队伍。我们的车子驶向西城,大多数中学和大学都在那里。

街上已充满了小贩、水夫和显然没有什么目的的路人的习见的群集。街上的叫喊声和木头车轴的呻吟声,织成北平早晨的交响曲。但我们的车子驶过各中学的大门口时,只见带着来福枪的警士把守着大门,拦阻校内兴奋的学生们。这时还没有宪兵出现——这种穿着黑色皮短衣,骑着机器脚踏车的特别警察,老是在这样的场合出现的。他们是突击队,受过特殊训练,专做这种工作,与在中国一切公共机关的大门前闲踱的和蔼可亲的警察大不相同。

“这该是一场好戏。”我的朋友顿君说。他是美籍青年记者,他在前一年的12月看见过游行示威运动。“警察简直没有出动,大多数中学生却已经出动了。”他狠狠抽着烟斗,抚摸他那未经修刮的下颌。清晨的空气是怪新鲜的,有霜的声音。

过了那条贯通南北、穿过西城的大街,我们迎面碰到第一群学生。他们故意沿着一条小路急走,不断地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加入,他们仿佛是从每个角落里出现的。脚踏车队在不整齐的队伍前面当心地侦察着。如果这时有警察出现,队伍很容易分散开来,过后再行集合。

我们拦住一个外貌诚恳的少年,他头戴学生帽,身穿中学生的制服,挟着一捆轻松的传单。

“你们在什么地方开会？”顿温和地问。

孩子怀疑似的皱一皱眉头，走开了。但一个女学生急跑上来作一番诚恳的解释，她那被风吹乱了的短发披盖着她的眼睛。

“这几位是外国新闻记者——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她把几张宣言和着色的讽刺画塞进我们车子的后座。“我们一到西四牌楼，就在那里开会。北大学生从东面来跟我们会合。10点钟在景山后边开大会！”

她挥一挥手，离开我们，学生们发现了听众，就喊起口号来：“中国不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很年轻，都很愉快。当一群一群的学生在大街上会合的时候，苦难就要到来。

在西四牌楼，四座着色的牌楼耸立在十字路口的上边，有普通的警察驻守。但宪兵还没有出现。

我们等待着，直到主力队伍——此刻有三四千人之多——的前部开始穿过街道，向东移动。旗子举起来了，开始唱歌了。一群人聚集在十字路口，好像被某种魔力吸引住似的。苦力们放下他们的重担，从眼睛拭去汗水，伸直脊背，注望着队伍。从市场来的小学徒们，在旗子旁边边跑边喊。

这行进的行列有一种奇特的刺激人的东西——这是一种在丁普哈夫^①和在红场上可以体验到的东西。但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行列，比莫斯科的青年节的场面，都更使我感动。这种拚命的姿势，这种处在极端劣势下的敢死队。这一天，正如过去其他日子一样，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他们未被冲散以前，在大刀和机关枪尚未活动以前，他们到底能走多远。我们除了钦羨这些不怕来福枪的扫射而自愿冲破警卫线的孩子们的胆量外，还有什么呢？他们中有许多都是14岁到18岁的中学生呀！

^① 丁普哈夫(Tempelhof)，柏林的工人区。

12月12日碰巧是段祺瑞的出殡日子,这个著名的安福系——华北最腐败的政府——的领袖享尽了福寿,此刻正被抬出他的旧都。段祺瑞是1926年3月18日下令向北平学生开枪的角色,他把学生骗诱到他的官舍外边狭窄的胡同里而加以陷害。当群众慌忙逃避段氏卫队的枪火时,差不多有100个尸体堆在胡同里,他们的鲜血湿透了尘土。那一天是段祺瑞的政治生涯的末日,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出殡规模之宏大。仿佛这从城外一个庙里涌向西山的殡仪,把北平大多数警察都吸引去了。我们所伴随的游行行列此刻至少有5000人,顺利地行进。前面是景山后边的城门,北大的队伍该在那里等待我们。

一小队宪兵终于出现了,跟着移动的队伍走。他们显然等待着袭击的机会。队伍突然到了一个女学校门外。许多学生离开行列,奔到庙门口喊里边的女学生出来参加。队伍出现了一个罅隙,警察们就挥着大刀和手枪冲入队伍里。

一时秩序大乱。许多裹在长袍里的女郎为着躲避这突然的袭击慌忙急走,终于跌倒了。那些停步扶她们起来的学生,遭受刀背的敲击,或笨重的军靴的蹴踢。这时还没有开枪,但逮捕好些学生领袖,便衣侦探早对警察们指出了这些领袖。这次突击很得其时,队伍暂时被冲散了。

但这不过是一个顿挫:当时没有足够的警察可以给学生真正严重的打击。领袖们重新调整行列,因为在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前面,又出现了另一支队伍。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旗子,听见他们的喊声。

“你以为他们能够会合吗?”我问顿。我们此刻是站在车外了,忙于摄影。他用一个拇指向前面的城楼一指:“看那边呀!”

30名左右的宪兵站在城门的前面,守住隔在两支队伍间的道路。他们有来福枪和机关枪,显然很紧张。这种光景看来更

加危险了。

我们连忙跑到队伍的前头，队伍业已停下开一个军事会议。两支队伍相距不过几百码路——如果联合起来，就有一万人之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竟有这么多学生出到街上，要控制这样庞大的群集，警宪的数量实在太少了。

但警宪们有枪，看样子，他们有开枪的可能；日子还很有希望，犯不着遭受过大的牺牲。队伍决定后退了。

命令传遍了行列。有抗命的啾啾声——在这种处境中向后转，适足以招致对方的袭击。——但纪律仍然很好。大旗向后转了，笨重的队伍开始移动。“他们有机可乘了！”有谁在我们后边抱怨道。

果然，结结实实的一队穿皮短衣的家伙疾奔而来。他们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从后面袭击行动迟缓的群众，冲散他们。队伍后部的学生担心地回顾着，但他们并没有离开队伍。警宪们加快脚步前来进攻，很像大屠杀的光景。

但正当肥胖的警长一边扳足毛瑟枪的扳机，一边发命令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混杂出现了。在警宪的后面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学生，他沉着地几乎是庄严地前进着。他愉快地微笑着，骑过警宪们的旁边时向他们喊道：“同胞们，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我们不是反对你们——我们仅仅反对日本侵略者。我们爱我们的祖国，正像你们一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番话语说得这样得法，像符咒一样发生效验。宪兵们停止追击了；凶狠的表情立刻从他们呆笨的大脸上消失了。学生们就抓住这个机会，一齐喊道：“我们爱国的警察万岁！”之后，当然没有什么事情了。

中国是富于这一类悲喜剧的。一个演说者竟有这样的力量，在别国实属罕见。这是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易动情的种